

# “我的朋友贾梦玮”

——贾梦玮其人其文

□李 舶

“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民国时许多人的口头禅。其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今，说到同样的感觉，我会说，“我的朋友贾梦玮”。

我的朋友贾梦玮，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学态度。

提到贾梦玮，总会想到一个既恬静又豪迈的名词——钟山。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位于钟山脚下的《钟山》杂志创刊。四十余年来，《钟山》以其包容、厚重、多元、人文的独特品格，深度介入中国当代文学进程，被广泛认可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实验场、桥头堡和节拍器。

贾梦玮深度参与、共同成长、担纲主持的《钟山》杂志，高擎“兼容并蓄、惟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的旗帜，致力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引领中国文学的路向，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之一。

历史学家米歇雷说过，“每个时代都在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贾梦玮就此阐发说，每个时代都在回忆前面的时代。回忆乃人的天性，它让历史成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一个作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记忆之职责”。正因为如此，贾梦玮将他的使命界定为以文学为武器，对抗时间的掠夺。他因此感慨，进步免不了冒失、鲁莽，因此是粗糙的。而过去和传统，因经过了时间的打磨，是光滑而精致的。最精致和微妙的往日，一定存在于文字之中。

初识贾梦玮，他顶着一头硬邦邦的短寸，不苟言笑，感觉他少年老成，沉稳厚重。相处日久，方知他的丰富多彩和宽柔包容，他是一个有着真感觉、真性情，活得恣意洒脱、又十分有趣的人。

四十年来，贾梦玮发型如昨，秉性如昨，悲欣如昨。他如同一只雄狮，盘踞在南京这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守护着象牙塔，也徘徊在十字街头，他用他标志性的头发和不苟言笑，见证中国文学走过一个又一个山岗，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

充沛的题材、新颖的技巧、丰厚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主编的眼光本身

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他对文学的千言万语。黑格尔曾经说过：“只有在天黑以后，密涅瓦的猫头鹰才会起飞。”是的——天黑以后，猫头鹰不仅在密涅瓦，也在思想者的心中盘旋。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贾梦玮喜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这句话，感慨所不能忘却的应该就是“往日情感”。正因为如此，他由编辑家转身文学家，试图用自己的书写，打量不完全可靠和完全不可靠的历史，将事件、人物、细节、时间中的“往日情感”，还原给真实的情绪、情愫、情境，并由此找到那个或许“没有形状”的“往日情感”的“实体”。这便是他一股脑儿捧出三部沉甸甸的散文作品——《南都》《红颜》《往日情感》的缘由。

《南都》考辨南京文史，《红颜》悲悼女性命运，《往日情感》感悟当下人生。贾梦玮在三部作品中，始终坚守这一个动作，抑或是一种品质——文学的回望。如他所言除了哲学的意义外，还是要从往日找到情感的力量，一个作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记忆之职责”。正因为如此，贾梦玮将他的使命界定为以文学为武器，对抗时间的掠夺。他因此感慨，进步免不了冒失、鲁莽，因此是粗糙的。而过去和传统，因经过了时间的打磨，是光滑而精致的。最精致和微妙的往日，一定存在于文字之中。

贾梦玮从青年时代起，便生活在南京，他对文学的回望是以南京为圆心的。徐悲鸿故居为何叫“无枫堂”？张爱玲最割舍不下的是什么？鲁迅为何未从水师学堂毕业？在《南都》中，贾梦玮对包括拉贝故居在内的诸多南京历史文化地标进行了实地探访，结合细致严谨的考据，追随张爱玲、赛珍珠、周氏兄弟、徐悲鸿等名人在南京的印记，讲述了这些建筑的前世今生，通过展现这些与南京息息相关的历史建筑、历史人物的命运，勾勒出南京这座城市华贵又落魄、端庄又沉郁的独特气质。

从东周的瞿叔隗、西汉的班婕妤，到盛唐时期的女帝和女官，直至19世纪末的慈禧太后

后……在《红颜》中，贾梦玮试图努力为历史上这些有名的女性人物，还原生命的本来面目。贾梦玮说，“我写女人，不光是写女性的命运，而是写人的命运。我写女人不会完全隔离男人写，就像写男人不会完全隔离女人一样”。对于自己的散文写作，贾梦玮有明确的大志向：“我要延续的是中国传统的文章传统。我希望我写的散文不是无关痛痒的，而是对世道人心有自己的立场和说法。我希望在散文写作领域中，可以做到当一个智者兼仁者。”

小说需要虚构，需要想象力，写好散文同样缺少不了想象力。贾梦玮说，散文或者文章作为文体的伦理，不能虚构，但也需要想象力。作家在文章中写一个人或者事、物，光写看到、听到的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天眼”去看更本质的东西。他认为，这个“天眼”其实质是想象力。贾梦玮从青年时代就立志做文章家，并且一直没有改变。我和朋友们很欢喜地看到他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贾梦玮曾经说过，“时间是一种掠夺，也是一种沉淀。时间对往日也进行着切割”。在他看来，“对于今天，昨天已是‘往日’；对于此刻，刚才已成以往。时间造成了‘往日’的流动”。我很喜欢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捕捉。将“往日情感”的“往日”视为“故乡”，在历史年轮的记忆中，发现“自我”与“存在”的意义，这便是贾梦玮文学思考的哲学价值。动与静，守与藏，舍与得，进与退……如此这般，万物皆在矛盾之中，守护意义，便格外艰难。

作为编辑家的贾梦玮，热情包容，像一块吸铁石，将四面八方的文学家吸引到他的阵地中来，与他一同战斗。作为散文家贾梦玮，正如他一以贯之的风格——清醒冷静、充满力量。

作为朋友的贾梦玮，既热情又冷静，既包容又严苛，既低调又高标，既执着又宽容。贾梦玮偏爱独处，不喜欢热闹，他说，沉默是金，是最伟大的力量。小说家朱辉评价贾梦玮，有重量的人生往往是低调的，好似秋收时沉甸甸的稻穗。

我深以为然。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 贾梦玮散文的历史意识与精神格局

□范培松

在当代散文创作的版图中，贾梦玮以其《红颜》《南都》《往日情感》三部散文集构筑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其中，《往日情感》中的“摇篮”以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我阅读体验中最难忘的篇章。或许是我同样拥有一位饱经苦难的母亲，我对文中展现的母性创伤有着特殊的共鸣。贾梦玮在这篇散文中，以近乎残酷的诚实记录了一个被三次转送的母亲形象，这种被遗弃的没有“人”的权利的创伤记忆，铸成了他的精神世界最初的经历，母亲的遭遇把追求“人”的权利刻骨铭心地植入他的灵魂，成了他文学创作最深层的动力源泉和永恒的追求。《摇篮》揭开了贾梦玮的散文的心灵密码，他的《红颜》就是为母亲们追求“人”的权利的呐喊！

贾梦玮对母亲被遗弃的感觉，绝非布尔乔亚式的忧郁，而是一个农子弟面对生存威胁时最真切的体验。人世间最痛的莫过于骨肉分离，而这种痛苦却反复降临在他母亲身上。正是这位苦难的失去“人”的权利的母亲，是贾梦玮人生的第一精神导师。细读《往日情感》中的其他篇章，我们会发现，这位农子弟的青少年时期，始终处于生存的悬崖边缘，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地寻找精神出路，每一个脚印都浸透着血痕。初中辍学的命运判决，本该将他永远禁锢在土地的轮回中，但是他有梦，为了实现梦，他必须读书，于是自己建造了一个“书斋”，在“书斋”，总有的里描写了他的“书斋”，那是“在家里谷仓的一角，我剪出一块，摞起两面半高的砖墙，然后在上面搁一块木板，一张书桌便大功告成”，这就是他的“书斋”。在这个谷仓里的“书斋”中，作者夏天“将双腿浸在水中，既可以降温又可以防止蚊虫的侵扰”，冬天让猫睡在膝头取暖，以此苦读。所读的书，“在偏僻的农村，要借一本像样的书都是很困难的。我只好去做临时工，干苦力，每天挣一块多钱；待攒下一些钱后，就去新华书店买几本自己想买的书……新华书店离家70多里地，骑自行车来回要6个小时。书买回来后就是一个个深更半夜的苦读”。这一谷仓里的“书斋”，成了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具震撼力的“学校”。他将省下的每一分钱化作远方的书籍，这是对知识近乎偏执的虔诚和神圣。在当今凭借指尖滑动就能获取海量信息的时代，阅读的便利反而消解了知识的神圣性。这种用生命兑换的阅读经验，让他的文字始终保持着痛觉神经的敏锐。贾梦玮的散文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描写近乎宗教苦修的知识获取方式，让他的文字从一开始便带着生命的痛感与重量。

贾梦玮的散文创作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兴盛的文化散文，是以“我”的历史开启了文化散文的存在。它的兴旺，意想不到的是竟激发了一场文化误会，写历史渐渐“以私为中心”，最终蜕变为“私”的狂欢，到90年代末，文化散文渐渐式微。恰恰在这种情况下，贾梦玮的历史文化散文《红颜》登场了，他以“我”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文化散文的旅行。

贾梦玮的《红颜》把镜头投向了历代的后宫。写尽了宫怨，宫妒，宫斗……《红颜》成了封建王朝的“后宫”博物馆。在笔者看来，他如此专注地关心女性的“人”的权利，和他母亲的三次被遗弃的惨痛经历有着内在的情感逻辑。当他进入历代后宫时，残酷的事实告诉他，妇女在皇权专制中，“人”的权利和生命最脆弱，最容易被践踏。他想借“红颜”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兴趣，对“人”的兴趣。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散文的衰落，恰恰正是作家们对“生命”和“人”的漠视。贾梦玮正是要缔建一个世界，并且要把我们驱入这个世界。对于这一点，散文创作常常使人误会，以为抒写一点自己情感就是散文终极目标。笔者认为，真正

的散文应该缔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精神的。缔建世界，需要作者有格局，格局也是精神。精神是“我”，“我”就是历史。贾梦玮的“我”的历史意识的精神指向很明确：反封建王权专制，追求“人”的权利，捍卫生命的权利。这是需要有掀桌子的无畏的勇气。在《红颜》中的许多篇章，如《江山美人》、《“祸水”之“水”》、《汝欲何为》等，作者和封建王朝专制势不两立，以决战的气概，写尽了后宫的精神创伤和各种苦难，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公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权利被践踏，“祸”在专制，疾呼：“专制制度乃是‘祸水’之源”，“在专制权力面前，男女一样会失去人性”。《红颜》是讨伐封建王朝专制的檄文，他要对封建皇朝专制的铁屋子爆破，这种近乎浪漫的讨伐，使我联想到了堂吉诃德。或许贾梦玮还有一个企图，想用他的大格局写作，使他的历史散文成为“我”的历史。笔者认为，从古到今，在所有记录描写历史的艺术作品中，历史就是“我”，“我”就是历史。在这面镜子中，照射出形形色色的“我”与“他”。贾梦玮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宣告，“我”回来了！“我”在！贾梦玮的文化散文的真正价值是具有精神格局的“我”的历史的复活。充满激情的“我”的历史的复活，给式微的文化散文注入活水，从而重现春色，这样的企图，也是一场浪漫。这正是我们讨论贾梦玮的散文的意义所在。

在贾梦玮反封建王权专制和追求“人”的权利的独立的大格局中，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他对生命意义和存在的探索。《往日情感》中的《此岸》，《南都》中的《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和《出入栖霞》为代表的三篇散文，皆是作者做的“心”上的文章，展示的是他的文化心理的养心之作。笔者认为，对生命意义和存在的探索，是追求“人”的权利的独立的拓展和必然，也是作者散文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支柱。贾梦玮对生命意义和存在的探索，都把它放到一对具有对立意义的命题中思考，“此岸”与“彼岸”（《此岸》），“屠杀”与“慈悲”（《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进”与“退”（《出入栖霞》），这些命题显示了当下社会的人生纠结，信仰的向往和精神的诉求。正如象征主义先驱梅特林克所说，“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在我所感知的世界里，而在目不能见，耳不能闻，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中”。贾梦玮的散文，正是努力想探索“目不能见，耳不能闻，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此岸》中出现的三对人物：法国阿维尼翁的修道院修女与送面包的青年，南京兜率寺里跪在佛像前的母亲和已经剃度出家的七八岁的儿子，江西葛仙山的年轻道士和他在电话中企求来看他的女友，似乎是目能见、耳能闻的当下，但是传递给我们的感觉是在“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中”。神秘之国中的意象明亮却又神秘，那就是“此岸”的“人”与“彼岸”的“人”。作者的重点显然在“彼岸”的“人”：修女没有言语，行动决绝，但是她拿着男青年送的面包；小和尚没有言语，却有行动，听从母亲指令关窗；年轻道士有声有色，满面泪水，发出了对女友的深情呼唤。这些画面，没有答案，却有想象，都让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和作者一起神思恍惚，“此岸”的“人”与“彼岸”的“人”生命连接存在何处？“彼岸”中的“人”又在“哪里”？这些恍惚激发了文章的无限，无限就是散文的“味”。读多了当今乏味的散文，就知道贾梦玮散文的可贵。读完“此岸”，我也恍惚，我能到“彼岸”吗？“彼岸”中的“人”在“彼岸”乎？而“彼岸”又在何方？

可以和《此岸》称为姐妹篇的是《南都》中的《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和《出入栖霞》。它们和《红颜》散文集中追求的“人”的权利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战争与善良：1865往事》是李鸿章创办的制造杀人武器的金陵机器局起笔，金陵机器局原址恰恰是历史上多个佛教寺庙如大报恩寺的遗址。“一面是人世的战争，另一面是出世的宗教”。后来金陵机器局又经历了国民党时期的金陵兵工厂，到共产党接管后的“军械总厂”，到“国营307厂”，到举世闻名的佛像制造企业“国营晨光机械厂”和“晨光集团公司”的变迁，画出了一条轮回的轨迹：“佛寺的废墟上建兵工厂，军工企业铸造佛像，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轮回？”“晨光集团公司”的前世今生的变迁，变来变去可以简化到“屠杀”与“慈悲”的轮回。作为“晨光集团公司”，是有形的存在，它的产品变化也是有形的存在，但是它画出的轨迹却是无形的，这种神秘的无形的抽象恰恰是人生的一种折射，人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晨光集团公司”却作出了另一种回答，即使用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来解释，也难以圆满。它给读者又一次制造了“此岸”与“彼岸”的无限的宗教式的恍惚。

相比之下，《出入栖霞》要理性一点。它开宗明义就提出：“世间大概没有哪国人像中国人这样纠结于‘进’‘退’与‘出’‘入’之间”。事实上，“进”与“退”可以囊括人的一生，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精神向度。作者把这样一个重大的哲学，宗教和人生的命题，交给了栖霞山。文章从栖霞高僧明僧绍写到名妓李香君，写到近代的高僧宗仰上人，作者统统是以入世的精神，给予赞美。出乎我意料的是最后作者提出的进退“最高的境界，大概是‘不进不退’”。并以玉泉昙懿禅师的话语作注释：“进一步则乾坤震动，退一步则草偃风行。且道不进不退一句作么生道？良久曰：‘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读到这里，我感到有些意外。和他在《红颜》中那些充满血性味的文章相比，“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追求，难以进入《红颜》铸造的精神大厦。昙懿禅师曾和宗杲禅师发生了一场关于柱杖的辩论，“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是他受到宗杲禅师锤炼的开悟，这也是他的超凡脱俗的一种追求。但是对于手持长剑，慷慨高歌的《红颜》作者，“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应该是他的奢侈的梦想了！

贾梦玮的散文创作有着独特的叙事策略。他常常从远处着笔，娓娓道来，如同举着温热的手火把引导读者前行，却在某个节点突然燃起熊熊烈火，将读者卷入思想的熊熊烈火之中。我称这种创作策略为“引火烧身”。在《红颜》的首篇《此情脉脉——说宫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从故宫中轴线起笔，通过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班婕妤的《怨歌行》等经典宫怨作品，构建起一条抒写古代宫怨的艺术长廊。正当读者沉浸在对宫女命运的同情时，作者笔锋陡转：“流传下来的‘宫怨’作品大多为文人仿作”，“‘宫怨’之作也都出自‘臣’或曾经为‘臣’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一转折犹如烈火骤起，直指中国文人与宫女在精神处境上的同构性，得出“仕（士）不过是皇上的‘妾’”这一振聋发聩的结论。通过对李白“谪仙”变“谪臣”的剖析，更是将宫怨主题提升到知识分子命运的高度。“我们”被卷进了“我”的历史所燃起的熊熊烈火之中了。“引火烧身”不是“卒章显志”的翻版，而是生命涌动的喷发。

正如里尔克所言，“艺术作品永远是孤独的，绝非评论可及，唯有爱能拥抱它，了解它，珍惜它”。贾梦玮的散文创作，正是这样一份需要用心灵去拥抱的孤独礼物。他对范仲淹的呼唤与追念，实际上是对士人精神的当代诠释。在这个意义上，贾梦玮完成了他关于苦难、尊严与自由的书写，而每一位读者，都将被他的生命之火点燃，成为这场精神之旅的同路人。这或许就是文学最珍贵的馈赠——在孤独的创作与用心的阅读之间，建立起超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025年初，贾梦玮的新散文集《往日情感》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本散文集距离他上一本散文集《往日庭院：南京老公馆》（百花文艺出版社）20年。距离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红颜挽歌》（岳麓书社）已经25年了。现在这两本散文集，分别以《南都》（译林出版社）和《红颜》（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书名再版。

最近两三年，贾梦玮持续发力，俨然形成继世纪之交他创作勃发之后的又一个小高潮。对一个有才华的写作者而言，也许我们会说，这两个小高潮之间隔得有点久。但是考虑到这二十年间，恰恰经历了贾梦玮的“中年写作”，且作为资深文学编辑家在廓清《钟山》杂志文学形象的同时——尤其是《钟山》散文（非虚构写作）形象，重建并重绘写作者审美风格学的文学肖像，这种写作的停顿和时间的绵延，应该是有意为之。它意味着写作者从青春后期进入到秋日般反思性中年写作。如果进而意识到反思性（或者说写作者的思想能力）对于散文文体的价值，那么，现在读到的《往日情感》写常识以及人之常情物之常理，一切皆有所思，一切思皆有情，应该是中年反思降临时的自然熟络。

贾梦玮自觉到时间绵延的意义。《往日情感》后记第一句，贾梦玮写道：“‘往日’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故乡’，人生不过就是对‘故乡’的永远的回望。”往日和故乡的互换和替代。时间的空间显形，回望亦即返乡。由于客观上存在的人在异乡，当我们谈论返乡的时候，往往是个体的精神事件。在后记的最后一段则更是将时间辩证法理解为：“时间是一种掠夺，也是一种沉淀。时间对往日也进行着切割。对于今天，昨天已是‘往日’；对于此刻，刚才已成以往。时间造成了‘往日’的流动。因这些文章写于不同的时间，‘往日’因此不再静止，成流动之状，呈现着自己的‘年轮’”。但是很奇怪，“往日情感”却是没有年龄的。“往日”是掠夺，“往日情感”却是沉淀，一种沉默。在这里，“往日”之远近，不再仅仅是物理时间之长短，它有另外一种计量方式，即情感之沉淀。如果按照物理时间对《往日情感》作编年，可以复原出贾梦玮童年（故乡）至中年（异乡）的成长史。以情感沉淀衡量，转瞬即为往日之此刻和需要耐心打捞的故乡旧时日，它们并流、汇流，它们被平等地看取。如此，回望和返乡作为个人精神事件则可能是日常的精神事件。也是如此，写作者的写作行为是持续不断地给日常赋予精神性意义。

平等（并不等于均等）地对待一切之往日。回望和返乡，就不会仅仅在身位、体感、调性和修辞等等的“怀旧”意义上展开。在发表于《十月》2024年第4期的散文新作《新大陆：南京与周氏兄弟》，贾梦玮辨析“新大陆”南京之于鲁迅精神的起点意义时，这样写道：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名气很大，中文翻译为“自新大陆”。但它常被人误为“致新大陆”，理解成写给美洲新大陆的赞歌，“自”与“致”，反了。德沃夏克创作第九交响曲，恰恰是表达身在新大陆美国的他，对旧大陆故乡捷克的思念之情。对南京新大陆，周氏兄弟既有“自新大陆”也有“致新大陆”。

以此识别《往日情感》写少年往事——那些在贾梦玮生命之初的人生初识之时，在人到中年之后，细事且莫等闲看，正是贾梦玮的新大陆的“自”和“致”。也正是从“致新大陆”之“致”，贾梦玮《南都》缅怀逝去时间之“自”是“清新俊朗”的，而不只是我们熟悉的废都斜阳和颓败落魄。在书写南京的文学谱系上，《南都》在时间意义重写、标识和定义的“南京”是意味深长的。《南都》“致”（“自”）复写“新大陆”式的书写，不由想到以写南京见长的叶兆言的《仪凤之门》重返中国现代发源地之一南京。

“往日庭院”变身为“南都”。《红颜挽歌》此次再版也隐去了“挽歌”。对读1999年版《红颜挽歌》和新版《红颜》，篇目几乎没有变化，但隐去“挽歌”，是中年写作期的贾梦玮回望青春后期的贾梦玮，其中必然包含审美意义的辨识和再认。隐去“挽歌”，使得这一本诞生于“反思的90年代”的时代之书，不至于在今天文学流通市场，径直地通向肤浅抒情的歧路，而被误读和误解。那么，回到《红颜挽歌》初版的20世纪末，如贾梦玮在《知识分子的表情》所言：“要分析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状况，他们内在的东西也许很难直接、直观地去把握。文风和表情，是思想和心理的外化，一是文的外在，一是人的外在。”写《红颜挽歌》那“一个时代”的“人的外在”，囿于和贾梦玮的交往是在新世纪以后，虽有江湖传说佐证，但“人的外在”的知识分子表情，殊难详说。不过，有《红颜挽歌》的“文”在，从文风识一个时代的“贾梦玮状况”依然有迹可循。

《红颜挽歌》是“长河随笔丛书”中的一本。“长河随笔”另外几种分别是《尴尬时代》《沧桑书城》